

基于“四化同步”的小城镇建设： 逻辑、模式与路径

卢新海 马小军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16053)

基于“四化同步”的小城镇建设： 逻辑、模式与路径

卢新海 马小军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于“四化同步”的小城镇建设:逻辑、模式与路径 /卢新海,马小军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622-8300-3

I. ①基… II. ①卢… ②马… III. ①小城镇—城市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2021 号

基于“四化同步”的小城镇建设:逻辑、模式与路径

© 卢新海 马小军 著

编辑室:职业培训教材中心

电 话:027-67863280

责任编辑:吴兰兰 胡小忠

责任校对:王 胜

封面设计:罗明波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 编:430079

销售电话:027-67863426/67863280(发行部)

邮购电话:027-67861321

传 真:027-67863291

网 址:<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press@mail.ccnu.edu.cn

督 印:王兴平

印 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1.5 字 数:184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4.00 元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作者简介

卢新海，同济大学管理工程博士，比利时鲁汶大学（KU Leuven）城市经济学博士后，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国土资源与不动产研究中心主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高级研究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研究课题 30 多项，出版专著与主编教材 10 余部，发表论文 200 多篇，获得省部级政府科技奖励 8 次。

马小军，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高级工程师，武汉市“黄鹤英才”计划获得者，武汉市首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曾获武汉市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现任湖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副会长，武汉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副会长，武汉天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天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天马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发表学术论文 10 多篇、参编著作 2 部，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奖 1 次。

前言

小城镇是指区别于大、中城市和农村村庄的具有一定规模、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居住的社区,包括国家已批准的建制镇和尚未设镇建制的相对发达的农村集镇。自1955年我国设立建制镇制度以来,我国小城镇得到了迅猛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撤乡设镇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我国小城镇数量由1978年初的2850个猛增到2002年的1.84万个,至今稳定在2万个左右。

小城镇的蓬勃兴起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小城镇已成为吸纳区域流动人口和资本、促进城乡各种要素双向流动、带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城镇建设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在产业结构、城市建设、与农村经济的联动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目前我国小城镇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缺乏科技和信息化支撑,产业链较短;小城镇建设中“重城轻镇”的观念较为明显,一味加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而忽视了小城镇人居环境的改善;小城镇建设过于偏重招商引资的数量和农民劳动力的转移等,这些问题与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发展理念严重相悖,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小城镇的动态、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探寻小城镇建设的创新路径已成为新常态下亟需解决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既是对当前突出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诠释与注解,也为小城镇建设指明了战略发展方向,特别是小城镇作为沟通协调城乡关系的桥梁、联结城市和农村的纽带,能够有效帮助农民实现就近就地就业,为实现“四化同步”发展提供平台。

然而,由于目前并没有形成具体的指导细则和实施办法,“四化同步”小城镇建设尚处于试点阶段,如何根据小城镇的发展特征和“四化同步”的内在要求,探寻出小城镇“四化协调”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小城镇建设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2013年开始,湖北省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了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凤镇在内的21个乡镇开展“四化同步”小城镇建设试点工作,旨在通过规划编制来引领小城镇的建设发展。作者受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委托,承担并完成了恩施州龙凤镇“四化同步”小城镇建设试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研究工作,对“四化同步”视角下的小城镇建设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考和认识。现集结成书,以期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本著作参考并借鉴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些在参考文献中列出,有些因为疏忽而遗漏,在此向所有涉及的文献的作者表示感谢!同时感谢湖北省社科基金的资助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辛苦劳动!

作者

2018年7月

目 录

1 基于“四化同步”小城镇建设的研究背景	1
1.1 研究缘起	1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	2
1.3 研究的理论基础	14
2 基于“四化同步”小城镇建设的逻辑解构	23
2.1 “四化同步”理论概述	23
2.2 “四化同步”的理论演进	39
2.3 “四化同步”理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作用	49
3 中外小城镇建设现状概述与特征分析	64
3.1 典型国家小城镇建设现状概述与特征分析	64
3.2 我国小城镇建设历史演进概述	75
3.3 我国小城镇建设的特征分析	87
4 基于“四化同步”小城镇建设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105
4.1 我国小城镇建设的一般模式	105
4.2 我国小城镇建设的基础路径	111
4.3 基于“四化同步”的小城镇建设新模式与新路径	124
5 试点小城镇的“四化同步”建设——基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视角	131
5.1 湖北省恩施市龙凤镇现状概况	132
5.2 城乡建设存在的问题	138

5.3 “四化同步”背景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策略 141

6 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框架与制度保障 157

6.1 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框架 157

6.2 小城镇建设的保障措施 159

参考文献 164

1 基于“四化同步”小城镇建设的研究背景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走城镇化发展道路是国际上遵循的一般规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不仅对中国经济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之一。”

2013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这项要求的提出延续了我国“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政策，也进一步明确了小城镇建设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1.1 研究缘起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财富都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城镇化发展水平也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30%发展到2016年的57.35%（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17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已经达到58.52%）。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同时，城市化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新的发展阶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从区域分布上来看，沿海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从发展模式来看，城镇化主要依托工业、交通发展起来，大多有资源消耗大、劳动力密集、人口流动性强的特点。二是城镇化发展的质

量有待提高。以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水平远高于以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水平,大量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城市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和公共服务;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投资驱动与资源消耗,随着能源和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很显然,中国城镇化发展迫切需要制度的创新与支持。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城镇化建设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涉及城乡关系以及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等诸多方面的协调。为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小城镇作为协调城乡关系、联结城市和农村的纽带,毫无疑问能够有效地帮助农民实现就近就地就业,为构建“四化同步”发展提供平台。

由于“四化同步”作为一项发展战略提出,并没有形成具体指导细则和实施办法,因此,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纷纷开展“四化同步”小城镇建设试点,以期通过试点来总结经验、形成理论,然后全面实施。如湖北省从2013年就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了包括恩施市龙凤镇在内的21个乡镇开展“四化同步”小城镇建设试点,旨在通过规划编制,来引领小城镇建设发展。显然,总结试点经验,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实践指导,是推动“四化同步”小城镇建设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与关键。

因此,基于“四化同步”理论指导下的小城镇建设的研究,对于充实城镇化理论研究的内涵、拓展“四化同步”理论研究以及进一步推动小城镇建设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由于这一研究高度契合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客观要求,因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

1.2.1 国外研究动态

(1) “四化同步”相关理论研究进展

“四化同步”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并结合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

具体要求所做出的战略部署,由于政策与体制等的差异,国外学者对于该领域研究较为缺乏。但是“四化同步”理论并不是一个完全新生的事物,而是在我国原有的“三化同步”理论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所提出的新要求,“四化”与“三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一个“信息化”。有关信息化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并且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何以信息化为抓手,与其他“三化”很好地融合起来推进“四化同步”,特别是城镇化的进程,是我国开展“四化同步”工作的重要基础。

① 信息化研究概况

围绕信息化主题的研究,始于1960年代,其成果见于日本与法国等学者的观点中。日本学者梅忠夫认为产业优化升级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信息产业的发展壮大,最终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动力,从而使得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①。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74)立足于信息与资源以及原料三大要素,提出涵盖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三阶段划分观点^②。

在国际学术界对于信息化概念与内涵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已较为成熟的背景下,众多学者将信息化的研究领域延伸至信息化与空间结构、信息化与城市发展层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② 信息化对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影响

随着信息化生产和信息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学者们开始关注信息化与区域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马克·圣巴泰勒米等(Marc Saint Barthélemy, Bernard Gondran, Eric Guichard, 2003)认为区域科学活动与因特网活动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信息化带动形成了创新区域,加速了空间结构的重新塑造^③。伊德戈德等(Indergaard, Michael, 1996; Marco Bellandi, 1997; Mike Raco, 1999)提出地理空间布局的邻近与集聚能够较为有效促进知识的流动与创新,这种作用往往会超出区域范围内部。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 1991)为代表的新空间经济学者认为,创新环境对于推动公司在空间布局上趋于集中具有重要意义。

① 伊藤阳. 日本信息化概念与研究的历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② DANIEL B.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M]. London: Heinemann, 1974.

③ 杨章贤. 信息时代区域发展与城市规划响应研究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③信息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信息化不仅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而且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1980年代中期至今,围绕信息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西方学者开展了系列研究。卡斯泰尔(M.Castell,1989)、巴拉斯(R.Barras,1990)、布罗特奇(J.Brotchie,1987)等人从技术进步与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角度研究了信息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卡斯泰尔认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意义即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同时刺激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引致为社会发展和城市结构的变化。巴拉斯等人则从技术变化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提出了“技术决定论”。布罗特奇等学者立足于技术变化的历史进程这一研究视角,深入论证了技术范式与发展方式同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将信息化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将城市作为点,放在区域尺度上将研究置于技术变化的背景下,分析高技术产业的区位因素;从劳动空间分工变化的角度入手,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斯科特(Scott,1985)和卡斯泰尔认为高技术产业的区位因素有:对技术创新源的易达性、劳动力质量、市场因素、集聚因素、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发达的通讯网与便利的交通。萨森(Sassen,2001)总结了以信息化为导向的服务业公司区位模式。

(2) 城镇化相关理论研究进展

相较于国外发达国家,我国城镇化进程约晚前者一个世纪;部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在20世纪即已极高,甚至已结束城镇化进程,并且在一部分中心城市超规模发展的国家出现了城镇人口向城郊回流的新趋势。这使得国外的城镇化研究相较于我国而言,在时间上早了许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形成了一批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学者和学术观点,其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下述3个层面:对城镇化概念与内涵的探析;对于城镇化空间结构与发展规律的研究;城镇化理论的多元化探索。

①城镇化的概念与内涵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对城市化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详细地讨论了城市产生的历史以及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城市化是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贡献,在《资本论》

中则阐明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观点^①。恩格斯与亚当·斯密也均对城市化问题进行了思考。西班牙工程师塞达(A. Serda, 1867)在其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首次使用了“Urbanization”一词来表达,英文将其翻译为城镇化或城市化^②。

韦伯认为经济增长与差异化发展是推动人口进入城市且集中于城市的重要支撑,也即形成城市化过程,这一规律是从19世纪欧洲的城市化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③。有关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城镇的动力源自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城市是人类社会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之后的产物,导致城市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近代工业革命所导致的生产力极大提高则促成了城市的大量出现,资本的积累和循环成为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工业等非农产业的发展为人口向城市集聚提供了岗位,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使得社会分工出现了新的特征,从事手工业的劳动力群体从农业劳动力群体中剥离,流向城市,从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以美国17世纪70年代为例,工业化的逐步推进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动力支撑,同时也较为有效地吸纳了城市劳动力,加剧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局面,进一步引致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微观角度考察城镇化的动力,城镇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中心,高于农村的收入、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领先的医疗条件与更好的受教育水平等因素都成为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推力。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学者,英国学者哈维(D. Harvey, 1973)在论述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时,所依赖的主要理论工具即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特征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研究城市化时所共有。

②城镇化空间结构与发展规律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不少国外学者将城镇化的研究视野转向全球领域,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也更加深入,研究领域拓展至城镇空间结构与发展规律,研究的代表理论观点集中于分散主义与集中主义。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吴衡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③ 钱学森,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设山水城市[J],城市问题,1993(3):3-4。

哈格斯特朗 (T. Hagerstrand, 1950) 对城镇化空间结构的研究提出了现代空间扩散理论; 佩鲁 (F. Perroux, 1955) 对城镇化空间结构的研究则提出了增长极理论; 弗里德曼 (Friedmann, 1964) 对城镇化空间结构的研究则形成了核心—外围模式理论。以 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对聚集形成机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刘易斯 (W. A. Lewis) 于 1954 年提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 其重要的假定是劳动力需满足无限供给^①。拉尼斯 (G. Ranis) 与费景汉 (John C. H. Fei) 在 1961 年提出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模型, 即二元经济顺利转换需要依赖于一定的先决条件, 主要为农业剩余的产生, 进一步取决于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②。

③城镇化理论的多元化探索

城市在诞生之初的主要功能是融合多种生产生活资料, 为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 促进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但是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 人们在原有基础上对城市作为人类生活的基础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诉求。因此有学者将城镇化置于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内进行研究, 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代表性理论有“生态城市”“田园城市”“有机疏散”等。

生态城市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的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1516) 的《乌托邦》和托马索·康博内拉 (Tommaso Campanella, 1623) 的《太阳城》^③。这些著作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对当时社会所进行的各种理想化假设。生态城市概念的发展是与实际问题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工业革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跨越, 伴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高, 城市也得到了大发展, 但是诸如环境污染、人口高密度、交通拥堵等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时, 生态城市的思想才开始被慢慢运用到解决城市问题。以霍华德为代表的“田园城市”理论在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 霍华德 (Ebenezer Howard, 1898) 认为基于城市所具有的刺激人口涌入的强大引力, 城市存在持续扩张的动力; 而城市无限制的扩张和

①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2 (2): 139-191.

② John C H F, Ranis G.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4): 533-565.

③ JINNAI HIDENOBU. Edo, the Original Ecocity [J]. Japan Echo, 2004 (2): 56-60.

土地投机机会进一步衍生为城市问题,突出体现为城市生态环境恶化。霍华德对于“田园城市”的设想,实际上由城市和乡村共同组成。在用地布局上,城市被农业用地所包围,在田园城市的边缘地区实质上就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形成一个“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在这个城市群中,城区用地占总用地的六分之一,若干个田园城市包围着中心,并借助快速交通可以抵达中心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态城市理论得到迅速的发展,帕克(Robert Park, 1952)在《城市 and 人类生态学》中利用生物群落观点来研究城市环境,把城市比作一个类似植物群落的有机体。1960年意大利保罗·索列里创立建筑生态学,提倡对有限的物质资源加以充分合理的利用,并告诫以牺牲自然结构来假设城市是十分不明智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批学者如理查德·雷吉斯特(Richard Register)^①、罗斯兰德(Roseland)^②将生态城市建设与管理结合进行了深入研究,生态城市研究步入实践阶段。1942年,美国学者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系统论述了有机疏散理论,并提出解决城市趋于衰败没落的对策;其认为在合理规划城市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使城市符合人类聚居需要而又不脱离自然的结构,是保证城市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3) 国外学者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研究

作为亚洲重要经济体和一个超级人口大国,中国的发展时刻牵动着世界经济的脉搏,因此,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以1978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为界,在此之前,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研究的主要群体为从事于中国古代、近代或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与其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有着密切关联,涉及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

1970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者对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见于Kirkby与Cannon等学者。柯克比(Kirkby, 1985)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失衡;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对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严重不足,使得城镇基础设施发展长期滞后;同时,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极

① SYBRAND P. Tjallingii. Ecopolis: Strategies for Ecologically Sound Urban Development [M]. Leiden: Backhuys Publishers, 2000.

② ROSELAND M. Dimensions of the Future: An Ecocity Overview [M]. Cabriola Island: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7.

大地抑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城镇发展的动力体系，使得城镇发展陷入动力不足的困境。Cannon 与 Jenkins (1990) 认为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条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的形成与运作有其必然因素；制约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于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径在空间布局与产业链条上缺乏集聚性特征。

归纳西方学者在信息化建设与城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首先，随着信息化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化的引领，信息化有助于提升城镇质量，优化城镇结构，促进优势产业集中，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其次，随着对于城市发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城市病”问题，城市发展应当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样的前提下，小城镇建设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1.2.2 国内研究动态

(1) “四化同步”理论研究

十八大以后“四化同步”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对于“四化同步”理论展开了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针对“四化同步”产生的背景、内涵、逻辑关系，“同步”的理解、实施路径等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本章对目前国内“四化同步”理论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整理与总结。

① “四化同步”理论产生的背景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许多学者认为经过前一个阶段的积累，农业支撑工业的时代基本结束，中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安同良等，2007；钱方明，2009；王建军等，2009）。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工业化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信息化的支撑。俞立平（2009）等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进行论证得出结论：信息化与工业化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信息化的发展能够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撑。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化同步发展。

② “四化同步”理论的历史演进

崔凯、冯献(2013)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化”建设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进程进行分析,将“四化同步”理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78年)工业化体系初步形成,城乡互助走向分割;第二阶段(1979—2000年)经济快速发展,二元结构加剧;第三阶段(2001—2011年)工农关系调整,城乡加快调整;第四阶段(2012至今)“四化同步”发展新阶段。

③ “四化同步”的理论内涵

厘清“四化同步”理论内涵是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基础。崔凯(2013)认为“四化同步”的本质实际上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李二超、韩洁(2013)认为“四化同步”的关键是“四化”互动,工业化是动力,信息化是灵魂,城镇化是引领,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对于“四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夏金梅(2013)认为新型工业化是龙头,农业现代化是基础,新型城镇化是主平台,信息化具有渗透、覆盖和拉动作用。崔凯、冯献(2013)认为“四化同步”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化。

④ “四化同步”发展的指标构建与现实选择

熊巍、祁春节(2014)对每一化独立地选取几个指标组成了一套体系,采取熵权法和灰色模型对“四化同步”发展进行综合评价。黄安胜、许佳贤(2013)同样对每一化独立地选取几个指标组成了一套体系,使用熵权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各级各项指标进行赋权、聚类,得出“四化”发展水平主要分为五组,呈现由高到低格局的结论。夏金梅(2013)认为衡量“四化同步”的标准即在于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程度;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协调程度。徐维祥等(2014)通过PLS 通路模型和空间距离测度模型对我国“新四化”同步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新四化”发展呈现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地区内发展不同步的双重矛盾。李二超、韩洁(2013)认为实现“四化同步”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重点是创新城乡产权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投入制度、科技制度、人才培养制度。崔凯、冯献(2013)认为“四化同步”的实现应当围绕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一主题推进,以“三农”问题为立足点,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曹前满(2014)通过研究发现“四化”各自肩负特殊时代使命,交互协调,“四化同步”的逻辑起点是结构转型,“四